

# 政治精英身份是农村创业的“动力”还是“牵绊”？

## ——“千村调查(2016)”的实证分析

万君宝 查君 徐婉渔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载使乡土中国发生巨变,但华夏农耕文化和农村历史演进过程所衍生出的“庇护—依赖”思想在村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基于印记理论,本文探讨了“庇护—依赖”印记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影响;并探索新兴创业文化如何通过削弱传统印记的作用进而影响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概率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在传统“庇护—依赖”印记下,农村政治精英所处的“舒适圈”强化了其风险规避意识,进而牵绊了其创业选择;创业氛围作为外来的文化环境,弱化了传统文化印记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牵绊”,且朋亲“小社会”内的强创业氛围更能带动农村政治精英选择创业。本文反映了传统文化印记对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农村开放及外部创业文化对传统乡土文化面貌改善的意义,深化了乡村创业动机研究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政治精英 “庇护—依赖”印记 创业氛围 创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9)07—0053—18

###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规划的部署下,我国农村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战”。“攻坚战”的胜利与否,在于政府的外部帮扶,更在于农民自主脱贫致富的意识。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渠道市场的扩展,资源要素实现城乡互通,农村创业不断深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达400万家,从事非农创业人员达3140万人<sup>①</sup>。这充分体现了农民在自主致富上的能动性,及农村创业在就业带动、促进“社会金字塔”底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Karnani,2007)<sup>[1]</sup>。首先,农村政治精英(本文专指村干部或党员),因其资源调动与分配能力,既在脱贫“攻坚战”中扮演“重头戏”,又是建设农村“希望田野”的“主力军”,其政治网络能弱化二元社会体系下农村资源劣势与城乡经济制度“鸿沟”(邹铁钉,2014<sup>[2]</sup>;陆铭和李爽,2008<sup>[3]</sup>;龙静,2016<sup>[4]</sup>)。面对创业,农村政治精英是如何选择的?已有学者对政治资本如何影响个体创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多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等同处理(吴一平和王健,2015<sup>[5]</sup>;田莉等,2015<sup>[6]</sup>),忽略了生态、历史、文化环境与个体心理、行为间的相互作用(杨婵等,2017)<sup>[7]</sup>。其次,农村政治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更在村落事务中进行领导、管理和决策,集权责于一身(杨善华,2000)<sup>[8]</sup>。第三,在村落自治下,村干部具有政府“代

收稿日期:2018-12-22

**作者简介:**万君宝,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企业文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电子邮箱:junbao64@aliyun.com;查君,男,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公司非市场战略、创业,电子邮箱:zjsufe17@163.com;徐婉渔,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公司战略、创业、风险投资,电子邮箱:Emiliewy@icloud.com。通讯作者:查君。

①统计资料源自中国农业部官网,详见网址:[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11/t20181112\\_6162797.htm](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11/t20181112_6162797.htm)。

理者”、村落“管家”和“理性人”等多重角色,行为决策受到更多混杂因素的影响。

根据印记理论(Imprinting theory),个体与组织在发展的“环境敏感期”内易被特定事件、文化和环境刻下印记,并持续受到影响(Marquis 和 Tilcsik, 2013)<sup>[9]</sup>。传统“小农经济”扎根土地,生产单位分散隔离,易受外部病灾侵扰(Pato 和 Teixeira, 2014<sup>[10]</sup>; Bar-EI 和 Felsenstein, 1990<sup>[11]</sup>)。低效的生产、动荡的环境、垂直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催生了传统中国乡村中精英与非精英间的“等级”关系与“庇护—依赖(patron-client)”思想(Oi, 1985)<sup>[12]</sup>。村落领袖协调分配村落资源(庇护方),普通村民服从、配合并对精英产生依赖(依赖方)(Oi, 1985)<sup>[12]</sup>。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集中并统一分配,掌握资源分配权的管理者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纪莺莺, 2012)<sup>[13]</sup>,而乡村政治精英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管理”角色,加深了农村“庇护”与“依赖”的思想印记,更确立了其精神领袖的地位。作为农民的“庇护者”,乡村政治精英拥有协调、分配和调动村落资源的责任和能力(杨善华, 2000)<sup>[8]</sup>;同时又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资源供给,这种双重“庇护—依赖”下的“舒适圈”导致其在经济活动中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周庆智, 2014)<sup>[14]</sup>,更畏惧创业失败的未知风险,对创业产生回避的心态。

传统文化为个体决策提供理论和规范,但亦会被个体行为重塑(什托姆普卡, 2005)<sup>[15]</sup>。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农业税取消、各类补贴等政策减少了农民对精英的依赖,削弱了精英的资源分配权。其次,乡镇企业因其社会价值获得了政府的肯定与支持(李炳坤, 1993<sup>[16]</sup>; Fan 等, 1996<sup>[17]</sup>),这也为其取得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在当前政府推出各项促进农村创业、外部资本下乡的政策并配套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的背景下,具有村落威望、最了解农村情况与政策的政治精英,成为开展“双创”工作,推动农村脱贫致富、产业升级的“领头羊”。当创业文化携带着外部资源、技术和规范,向隔离、封闭的农村地区席卷而来时,传统“庇护—依赖”的文化印记是否会衰败(Marquis, 2018)<sup>[18]</sup>? 乡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是否不同?

综上,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在我国农村独特的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思想下,农村政治精英是否更可能创业?(2)在“乡村振兴”和“双创”的政策背景下,创业氛围所代表的新兴创业文化如何影响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3)农村“小社会”中的朋亲强关系又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本文基于印记理论关注了传统“庇护—依赖”文化印记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牵绊效应”,并采用全国“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下,新兴创业文化对传统思想印记的冲击和替代,揭示了文化印记衰微的动态过程;农村“朋亲圈”内的创业氛围在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过程中起到了“带动效应”。本文扩展并深化了乡村创业动机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对农村文化建设及“外部文化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作出贡献。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1. 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1)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我国古代农耕经济表现出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家庭(族)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村生产单元高度分散、单元之间交易成本高,难以形成合作(Pato 和 Teixeira, 2014<sup>[10]</sup>; Bar-EI 和 Felsenstein, 1990<sup>[11]</sup>; 李根蟠, 1998<sup>[19]</sup>);二是生产力落后和人口持续增长加深了农民对土地、尤其是良田的依附(阎万英, 1994)<sup>[20]</sup>，“禁民流动”的古代户籍制度(张琳, 2012)<sup>[21]</sup>,禁锢了农民的流动性,催生出浓厚的乡土情怀。“小农”生产模式和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加深了村域的封闭,并形成农民对集体自治和宗族领袖的自然需求。作为农村“小社会”的核心内聚力(张佩国, 2011)<sup>[22]</sup>,宗族关系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持续发挥着抵御饥饿和病灾等社会动荡的作用(杨婵等, 2017)<sup>[7]</sup>。但宗族文化中的等级、秩序与保守性(赵世瑜, 1999)<sup>[23]</sup>,也使农业社会下的传统主义文化表现出人情导向、差序结构及较高的权力距离等特质(李新春等, 2017)<sup>[24]</sup>。

在动荡、封闭的空间中,村落领袖凭借其资源占优、威信和能力协调村务、与外界建立联系,为村民提供庇护(Walder, 1986<sup>[25]</sup>; Oi, 1989<sup>[26]</sup>; Wank, 2001<sup>[27]</sup>);而村民则对村落领袖形成依赖并给予其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Scott, 1972)<sup>[28]</sup>,村落精英与非精英间形成了“庇护—依赖”的关系模式。

传统“庇护—依赖”的关系模式在我国农村发展的“环境敏感期”内发挥影响(Marquis 和 Tilesik, 2013)<sup>[9]</sup>,进而形成了“庇护—依赖”的文化印记,催生了农民“重仕轻商”“安于现状”等小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制的国家治理体系打破了小农经济“小国寡民”的状态,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方式将“一袋马铃薯”式的社会高度整合(周庆智, 2014)<sup>[14]</sup>,政治精英则在其中发挥着管理和资源分配的作用。这提高了农村经济运行的效率,更确立了政治精英在农村地区的领袖地位,加深了农民对资源“自上而下”的认知和“等、靠、要”的被动观念,这种认知与观念进而加强了普通村民对于政治精英的依赖心理。进入人民公社时代,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权力观念随着多次农民运动得到强化,追求“仕途”和体制的思想在农村地区被进一步巩固(周庆智, 2014)<sup>[14]</sup>,甚至上升为社会规范,这更加深了农村政治精英对于体制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农村政治精英不仅为村民提供庇护,同样受到体制的支持:一方面,他们依赖体制获取安全感,又通过庇护村民获得成就感;另一方面,他们能接触到上级的资源分配信息,又对本村资源具有一定裁量权。双重“庇护—依赖”关系在农村发展的不同“敏感期”内刻下印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通过民主参与选举村委会成员,实现自我管理、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增强加剧了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王春光等, 2018)<sup>[29]</sup>,催生出农民的社会性竞争和地位焦虑(杨华和欧阳静, 2013)<sup>[30]</sup>。然而,在“庇护—依赖”印记的作用下,普通农民的民主参与与决策意识尚在培养,对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的村务参与热情不高,或者把话语权默认委托给农村政治精英(曲延春, 2015)<sup>[31]</sup>。同时,基层政府习惯性地村委会视为下属延伸机构,诸多工作如村落集体项目的规划、农民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等,都要求村落政治精英协助开展(贺雪峰, 2018)<sup>[32]</sup>。因此,农村政治精英身份被视作一种社会地位和权威符号,能有效解决农民所面临的地位焦虑。文化印记通过“学习和复制”效应在我国农村这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相对封闭的聚落空间中较为稳定地传承(胡彬彬和邓昶, 2019)<sup>[33]</sup>,持续影响农民的行为选择(Marquis 和 Tilesik, 2013)<sup>[9]</sup>。

传统的“庇护—依赖”印记为农村政治精英同时“画下”心理和资源的“舒适圈”。除了村民认可、社会地位与村落威望等心理和精神的满足感之外,“舒适圈”还体现在:拥有村内外资源的优先接触权和相对灵活的裁量权,以及体制对子女、家庭所产生的正向“溢出”,如更多社会资源、收入、职业空间以及家庭经济财富等(谭远发, 2015)<sup>[34]</sup>; Judge, 1992<sup>[35]</sup>; Liu, 2003<sup>[36]</sup>),这在资源渠道缺失、制度不健全并且个人发展路径单一的农村尤为重要。心理和资源上的“舒适圈”强化了农村政治精英的风险规避意识,在享受相对收益的同时,他们对风险和损失表现得更加敏感(Tversky 和 Kahneman, 1992)<sup>[37]</sup>。这一则源自传统文化中“风险规避”的基因(Lau 等, 2010)<sup>[38]</sup>——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足(秦立建等, 2014)<sup>[39]</sup>,城乡信息不对称而催生出“模糊风险厌恶”(Ahsanuzzaman, 2015)<sup>[40]</sup>;二则源自创业失败后“丢面子”的顾虑,“面子”是村庄“熟人社会”中的“社交性货币”(董磊明和郭俊霞, 2017)<sup>[41]</sup>,相较普通村民,政治精英的创业失败对其威信“面子”将造成更负面的影响。而农村政治精英体系具有较强稳定性(王春光等, 2018)<sup>[29]</sup>,“千村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 1151 个村庄中,约 40% 的前任村长晋升或平调,仅 1.22% 的前任村长因创业离职,干部结构的稳定性亦会牵绊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故农村政治精英更倾向于留在体制内,并在面对市场经济时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而非政治精英因处于相对损失的状态,对创业表现出较强的“创新精神”。因此,基于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sub>1a</sub>: 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下,相对于农村非政治精英,农村政治精英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低。

(2)政治资本的“动力”视角。已有针对城市居民创业选择的研究大多秉持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政治精英嵌入在不同的政治网络中,通过网络广度和嵌入深度获取相应的信息和资源(Coleman,1988<sup>[42]</sup>;Lin,2002<sup>[43]</sup>)。由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已有研究大多认为政治资本是创业活动的动力(吴一平和王健,2015<sup>[5]</sup>;田莉等,2015<sup>[6]</sup>;杨婵等,2017<sup>[7]</sup>)。相对于其他职业选择,创业活动不仅具有较高的资金门槛,同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除了面临严酷的竞争外,还需要和各级部门互动。因此,充裕的资源和渠道对于农民“选择创业与否”的决定至关重要。

农村政治精英不仅长期本土“耕耘”,熟悉村落发展变迁与人情世故,且具有村落威望和足够能力调动和整合资源,加之政治精英身份所拥有的合法性能够帮助其相对容易的获取银行贷款(杨婵等,2017)<sup>[7]</sup>,更能打通创业所需的“资金流”。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村落基层自治的要求下,村干部等政治精英拥有“政府代理者”“村庄当家者”和“理性人”三重角色(付英,2014)<sup>[44]</sup>。他们作为“政府代理者”协助政府管理村民,既熟知创业扶持政策以降低行政审批成本,又更容易取得身份合法性,相对优先地获得政府项目与支持,这为创业奠定了资源基础;他们作为“村庄当家者”全面了解本村发展现状,能有效识别潜在创业机会,并带领村民开展大规模创业活动;而“理性经济人”指在基层自治下,村委在村级决策和集体财产处置方面享有相对灵活的裁量权,故部分村干部可能利用权利空间为后续创业积累资源(肖唐镖,2006)<sup>[45]</sup>。不同于传统的体制内政府官员,村干部多为村民兼业,在不开展行政事务时需从事生产活动。在国家促“双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村干部往往被鼓励带头从事创业活动,如当前村委选举时签署创业承诺书的现象。因此,基于政治资本的“动力”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sub>1b</sub>:政治资本的“动力”视角下,相对于农村非政治精英,农村政治精英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高。

## 2. 创业氛围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创业活动嵌入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中(齐玮娜和张耀辉,2015)<sup>[46]</sup>,创业者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信息,且个体创业兴趣和信心亦受环境影响(吴小立和于伟,2016)<sup>[47]</sup>,尤其是农民信息获取途径少、信息解析能力弱,其决策更易受到环境影响进而表现出“羊群行为”(杨卫忠,2015)<sup>[48]</sup>。尽管农村传统“庇护—依赖”的文化印记可能牵绊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但是,乡土社会亦发生着“转型巨变”: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创了农民创新、创业的“先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取得合法性,并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李炳坤,1993)<sup>[16]</sup>;2006年免除农业税后,政府提供了各类农民、农村补贴,这虽然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产生“寻租行为”,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村政治精英在面对市场经济时的主动性与决策的多元性,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创业因其社会价值得到了各界好评,而互联网时代下电商平台如火如荼地发展,又为农村创业带来新一轮机遇。相对于传统文化,创业文化在较为封闭与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新兴的、外来的,其中饱含着市场经济、开放竞争与冒险创新的内涵和价值观,更要求文化主体的独立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周亚越和俞海山,2005)<sup>[49]</sup>。当外部创业文化携带着新技术、新思想向封闭的农村席卷而来时,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是否又会有所不同?作为新兴的外部文化环境,创业氛围包括人们对创业活动的价值观、感知态度及一系列非正式的社会规范(Tsui等,2007<sup>[50]</sup>;Noseleit,2010<sup>[51]</sup>;蒋剑勇和郭红东,2012<sup>[52]</sup>)。创业氛围越浓厚,代表村民对创业活动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创业环境与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村民承担创业风险的意愿整体上更强。本文认为,创业氛围通过“冲击效应”“激励效应”和“带动效应”三条主要路径影响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首先,创业氛围对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冲击效应”,弱化了农村政治精英“重仕轻商”的思想

和村落场域内“庇护—依赖”的传统文化印记。从文化冲击和更替的视角来看,创业文化的涌入将原本相对封闭的农村“小社会”打开了一个“豁口”,使得外部信息、知识和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随着创业氛围的逐步增强,创业文化成为新的社会规范,现代文化将引发传统“庇护—依赖”思想印记的嬗变(王淑芹和刘畅,2017)<sup>[53]</sup>。创业文化中的市场主体精神和独立意识有助于提高农民市场活动与民主决策的参与度,削弱农村政治精英对于体制资源的依赖心理;同时,创业文化中的务实、开拓与冒险精神,也会对农村政治精英的体制虚荣心和自我满足感产生冲击。加之当前国家对农村创业的大力支持,不仅降低了体制“庇护”的吸引力,更有机会让农村政治精英重新认识自我价值和当代发展机遇,其积极的创业态度被调动,面对市场经济时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也得到了增强。

其次,创业氛围对农村政治精英走出“舒适圈”产生了“激励效应”。一方面,创业文化催生出更加多元的职业选择,扩展了农民的发展路径和空间,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源获取无需依托体制实现。通过创业能获得资本积累并创造社会贡献,在实现个人财富和价值目标的同时,也推动着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新时代的价值追求激励着农村政治精英走出“舒适圈”。另一方面,浓厚的村落创业氛围中拥有丰富的创业信息和完备的创业配套设施,如市场和渠道,这能有效弱化创业的超前性和不确定性(张玉利和杜国臣,2007)<sup>[54]</sup>,降低农村政治精英的“模糊风险厌恶”(Ahsanuzzaman, 2015)<sup>[40]</sup>和“丢面子”的顾虑(董磊明和郭俊霞,2017)<sup>[41]</sup>,激励农村政治精英运用自身资源禀赋“另创天地”。

第三,朋亲“小社会”内的创业氛围通过信任感与身份认同感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产生了“带动效应”。由于我国农村为基于亲缘和家族认同形成的、拥有“差序结构”的“小社会”,朋亲在农民的思想、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费孝通,2012<sup>[55]</sup>;董静等,2018<sup>[56]</sup>)。相对于普通关系网,“小社会网”具有高强度、半径短的特点(郭云南和姚洋,2013)<sup>[57]</sup>,关系双方表现出极强的承诺关系与信任感。对政治精英来讲,“小社会网”中创业的亲友,除了向其传递资源和信息外(Kwon 和 Arenius, 2010<sup>[58]</sup>;杨隽萍等,2017<sup>[59]</sup>;金迪和蒋剑勇,2014<sup>[60]</sup>),更通过朋亲间的高度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感,帮助政治精英消除创业顾虑,使其不必担心亲友因传统“官本位”思想、风险规避意识而产生的困扰,且“强关系”能帮助农村政治精英识别非体制内的市场风险(杨隽萍等,2017)<sup>[59]</sup>。基于与亲友间可靠的沟通和学习,增加自己的能力素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sub>2a</sub>: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下,创业氛围弱化了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

H<sub>2b</sub>:政治资本的“动力”的视角下,创业氛围强化了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

综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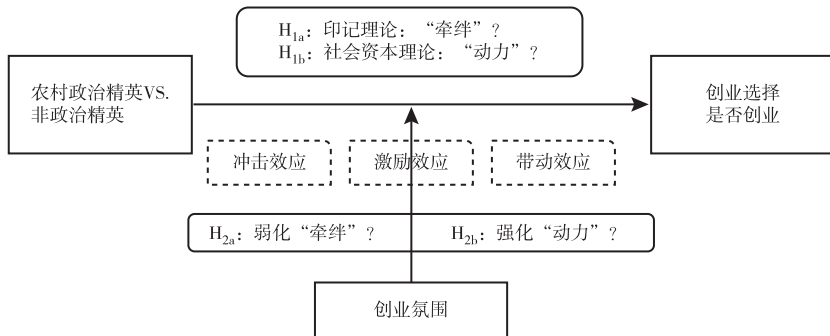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与假设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 三、研究设计

#### 1. 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来自“千村调查(2016)”项目。该项目自2008年启动,每年对我国农村进行不同的主题调研。2016年调研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从镇长、村长、村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等多来源反映中国农村地区的创业现状。本文选取村长、创业者及非创业者问卷,根据村代码匹配。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数据前后明显不一致及港澳台样本(董静等,2018)<sup>[56]</sup>,形成有效问卷14122份。其中,30.88%和12.08%的样本来自我国东南和环渤海地区,20.94%的样本来自中部地区,东北、西南地区样本占比为5.53%和17.48%,13.09%的样本来自西北地区;受访者中男性占比约69.74%;样本平均年龄约4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

#### 2. 变量选择

**因变量:**创业选择(*Entrep*)。现有研究对创业选择的衡量主要是判断调查对象是否从事(过)自营工商业等创业活动(蔡栋梁等,2018<sup>[61]</sup>;叶文平等,2018<sup>[62]</sup>)。结合现实情况,本文将农村创业活动不限定为从事自营工商业,而是指当地农民试图通过创建新企业或组织的方式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这一界定与“千村调查”保持一致。变量测量上,“千村调查”选择拥有创业经历和未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分别填写创业者问卷与非创业者问卷,两份问卷在内容上存在交叉。本文根据被试所属的问卷类型区分,若来自创业者问卷,代表进行了创业选择,该变量记1;若来自非创业者问卷,则代表从未选择过创业,该变量记0(杨婵等,2017)<sup>[7]</sup>。其中,创业者占比达32.55%。

**自变量:**农村政治精英(*Polielite*)。村干部和党员在村落发展与治理中发挥显著影响。本文采用指标“是否(曾)是党员或村干部”对农村政治精英进行衡量。若是,该变量记1;反之记0。

**调节变量:**创业氛围。前人大多以量表测量被试的主观感受(蒋剑勇和郭红东,2012)<sup>[52]</sup>,但易受个体认知偏差的影响。由于个体认知、态度能外化于行为,故某区域范围内农民整体的创业行为和创业环境建设能反映该区域的创业文化。本文采用以下代理变量衡量村落中创业氛围的强度:(1)本村近一年内参与创业的家庭总数(*Family*);(2)本村现有小微企业总数(*Microenterp*);(3)本村是否存在创业企业载体,如大型商贸市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Market*)。这三个指标由村长加以评估。(4)“受访者正在创业的亲友数(*Relatives*)”,以此考察农民朋亲“小社会”在创业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作用。该指标由受访者填答,更能反映农民“强关系圈”内的创业氛围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村落的创业氛围与基于“朋亲圈”的创业氛围并不具有严格的分类学意义和明确的界限,尽管村落创业氛围越强,农民“朋亲圈”内的创业人数可能相应越多,但反之却不一定成立。本文对调节变量(1)、(2)、(4)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内涵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选择(过)创业	14122	0.33	0.47	0	1
自变量	农村政治精英:村民是否(曾)是党员或村干部	14122	0.24	0.42	0	1
调节变量	村落创业氛围:村长评价本村近一年创业家庭数取对数	14122	1.80	1.38	0	5.66
	村落创业氛围:村长评价本村小微企业数取对数	14122	1.81	1.45	0	5.44
	村落创业氛围:村长评价本村是否存在企业载体(如大型商贸市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	11972	0.27	0.44	0	1
	“朋亲圈”内创业氛围:村民自评的创业亲友数取对数	13967	0.31	0.50	0	1.79

续表 1

类别	内涵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性别:若受访者为男性记为 1,女性则记为 0	12525	0.70	0.46	0	1
	年龄:受访者实际年龄	12527	45.36	12.74	17	91
	受教育年限:将受访者的学历折算为受教育年限。具体折算方法为:文盲为 0,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是 6、9 和 12,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是 16、19 和 23	12363	10.76	3.85	0	23
	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全村平均组	13069	0.15	0.36	0	1
	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全村平均组	13069	0.28	0.45	0	1
	区域:西部组	14122	0.31	0.46	0	1
	区域:东部组	14122	0.48	0.50	0	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本文首先控制了创业选择主体的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其次,控制了其家庭经济水平。家庭经济往往是创业活动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并影响创业者及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全村平均水平为基准组生成两组虚拟变量: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平均组和高于平均组。最后,控制样本所在区域。将样本分为中部、西部和东部三组,基于中部组,生成虚拟变量西部组和东部组。

### 3. 模型与方法

本文构造 Probit 概率模型:

$$\begin{aligned}
 Prob(Entrep = 1 | polielite) = & \beta_0 + \beta_1 Polielite + \beta_2 Family + \beta_3 Microenterp \\
 & + \beta_4 Market + \beta_5 Relatives + \beta_6 Polielite \times Family \\
 & + \beta_7 Polielite \times Microenterp + \beta_8 Polielite \times Market \\
 & + \beta_9 Polielite \times Relatives + \gamma Controls + u \tag{1}
 \end{aligned}$$

其中, *Entrep* 代表农民创业选择,  $\beta_0$  代表常数项, *Polielite* 代表农民是否为政治精英, *Family* 代表全村近一年的创业家庭数, *Microenterp* 代表本村小微企业数, *Market* 代表本村是否存在大型商贸市场等, *Relatives* 代表受访者的创业亲友数, *Polielite* × *Family*、*Polielite* × *Microenterp*、*Polielite* × *Market*、*Polielite* × *Relatives* 分别代表政治精英与创业氛围四个代理变量的交互项, *Controls* 代表所有被控制的变量, *u* 则代表随机扰动项。

本文首先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村庄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以避免同村居民之间的相关性,并对 Probit 模型估计系数计算了边际效应。其次,对研究结果从样本、变量和方法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考虑了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区域异质性,并探索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类型。

## 四、实证分析

### 1. 相关性分析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2 所示。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相关。村落创业氛围的三个代理变量中,“村创业家庭数”“村小微企业数”与农民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而“村企业载体:如大型贸易市场、工业园区”与农民创业选择未有明显相关性。受访者“朋亲圈”内的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与农民的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此外,控制变量中,男性农民

更倾向于做出创业选择;农民年龄与创业选择负相关;农民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与其创业选择正相关。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大小表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1.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2. 农村政治精英:是否(曾)是村干部或党员	-0.10***					
3.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庭	0.04***	-0.004				
4.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业数	0.03***	0.001	0.34***			
5. 村落创业氛围:村企业载体	-0.005	0.01	0.17***	0.29***		
6.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	0.16***	-0.02**	0.01	-0.01	-0.02*	
7. 性别	0.17***	0.07***	0.02*	0.03***	0.02***	0.02**
8. 年龄	-0.03***	0.15***	0.004	-0.001	-0.01	-0.11***
9. 教育年限	0.08***	0.02**	-0.003	-0.03***	-0.01	0.07***
10.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0.16***	0.01	0.01	0.01	0.003	-0.09***
11.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0.33***	-0.01	-0.01	-0.02**	0.003	0.11***
12. 西部组	-0.001	-0.01*	0.03***	0.09***	0.02***	0.01
13. 东部组	-0.001	0.01	-0.03***	-0.07***	-0.05***	-0.05***
变量	7	8	9	10	11	12
8. 年龄	0.14***					
9. 教育年限	-0.03***	-0.44***				
10.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0.01	0.12***	-0.15***			
11.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0.07***	-0.07***	0.15***	-0.27***		
12. 西部组	-0.01	-0.09***	-0.08***	0.05***	-0.02*	
13. 东部组	-0.03***	0.06***	0.13***	-0.07***	0.04***	-0.6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2. 回归分析

(1)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首先,对假设  $H_{1a}$  和假设  $H_{1b}$  所提出的两条对立性假设进行检验,探索在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中,到底是文化印记的“牵绊”作用更加明显还是政治资本的“动力”效果更加明显?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放入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模型2增加自变量“农村政治精英”。结果显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政治精英。通过将非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后发现,政治精英的创业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15%<sup>①</sup> ( $p < 0.01$ )。因此,在本文提出的两条对立的平行假设中,假设  $H_{1a}$  得证,即:传统“庇护—依赖”的印记下,农村政治精英所处的“舒适圈”牵绊了其创业选择。模型1、模型2的正确预测率良好,分别为68.87%和69.62%。此外,模型1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男性比女性创业的概率高出18% ( $p < 0.01$ );受教育程度提升农民创业的可能性;家庭经济水平与农民创业选择正向相关:相对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全村平均水平的组别,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组的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高出31% ( $p < 0.01$ ),而低于平均组的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低约13% ( $p < 0.01$ )。

① 本文模型为Probit非线性回归模型,表格中汇报的回归系数的大小不代表边际效应大小,通过对回归系数进行转化,得到边际效果  $dy/dx$ 。



表 3 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1		模型 2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农村政治精英			-0.404*** (0.034)	-0.147*** (0.012)
性别	0.486*** (0.031)	0.177*** (0.011)	0.508*** (0.032)	0.184*** (0.011)
年龄	-0.0003 (0.001)	-0.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教育年限	0.009* (0.004)	0.003* (0.002)	0.013*** (0.004)	0.005*** (0.002)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0.349*** (0.042)	-0.126*** (0.014)	-0.355*** (0.042)	-0.128*** (0.014)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0.808*** (0.033)	0.311*** (0.012)	0.810*** (0.033)	0.311*** (0.012)
西部组	0.007 (0.039)	0.003 (0.015)	0.008 (0.039)	0.003 (0.015)
东部组	-0.034 (0.035)	-0.013 (0.013)	-0.038 (0.036)	-0.015 (0.014)
常数项	-0.902*** (0.093)		-0.991*** (0.094)	
Wald chi2	1170.48		1261.10	
Prob > chi2	0.000		0.000	
Pseudo R2	0.1026		0.1141	
观测值	11271		11271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针对模型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针对边际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创业氛围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创业氛围对于主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模型4中分别放入创业氛围的四个测量指标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乘项。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表明:村落创业氛围对主效应的调节效果均不显著;模型4表明,“朋友圈”内的创业氛围能显著弱化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调节作用如图2所示。创业亲友越多,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间的负向关系越弱;创业亲友越少,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间的负向关系越强。这说明:朋亲“小社会”内的创业氛围通过信任感与身份认同感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产生了“带动效应”。

若考察创业氛围对于农民整体创业选择的影响,模型1、模型2、模型4中,村创业家庭数( $dy/dx = 0.02, p < 0.01$ )、村小微企业数( $dy/dx = 0.02, p < 0.01$ )以及农民创业亲友数( $dy/dx = 0.04, p < 0.01$ )均显著促进农民整体的创业选择。而村企业载体,如大型商贸市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并未促进农民整体创业选择。由此可知,尽管村创业家庭和企业数能够促进农民整体的创业选择,但对农村政治精英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表 4 创业氛围的调节作用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农村政治精英	-0.404*** (0.034)	-0.405*** (0.034)	-0.424*** (0.043)	-0.414*** (0.034)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庭数	0.046*** (0.012)			
政治精英×村创业家庭数	-0.008 (0.033)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业数		0.041*** (0.011)		
政治精英×村小微企业数		-0.020 (0.032)		
村落创业氛围:企业载体			-0.038 (0.039)	
政治精英×企业载体			0.114 (0.085)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				0.105*** (0.015)
政治精英×创业亲友数				0.090** (0.039)
性别	0.506*** (0.032)	0.505*** (0.032)	0.480*** (0.035)	0.505*** (0.032)
年龄	0.002 (0.001)	0.002* (0.001)	0.003* (0.002)	0.003** (0.001)
教育年限	0.013*** (0.004)	0.014*** (0.004)	0.013*** (0.005)	0.014*** (0.005)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0.358*** (0.042)	-0.357*** (0.042)	-0.355*** (0.047)	-0.337*** (0.042)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0.814*** (0.033)	0.814*** (0.033)	0.830*** (0.036)	0.795*** (0.033)
西部组	0.007 (0.040)	0.001 (0.040)	0.033 (0.042)	0.010 (0.040)
东部组	-0.035 (0.036)	-0.033 (0.036)	0.000 (0.038)	-0.025 (0.036)
常数项	-1.073*** (0.097)	-1.071*** (0.096)	-1.087*** (0.103)	-1.107*** (0.096)
Wald chi2	1268.45	1273.08	1071.97	1316.09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157	0.1154	0.1156	0.1249
观测值	11271	11271	9506	11232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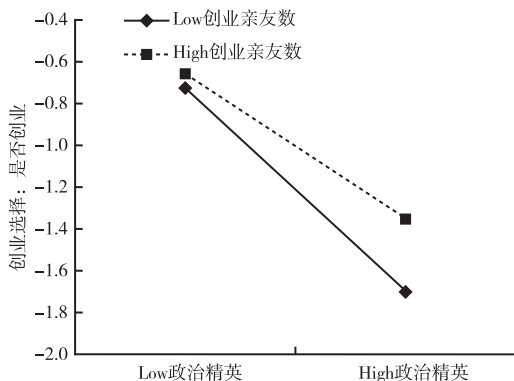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朋亲圈”内创业氛围的调节效果图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从样本、变量和研究方法上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sup>①</sup>。在研究样本上,本文选取年龄大于30岁的受访者进行重复检验(吴一平和王健,2015)<sup>[5]</sup>。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回归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一:样本筛选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农村政治精英	-0.378*** (0.033)	-0.377*** (0.033)	-0.379*** (0.033)	-0.395*** (0.042)	-0.386*** (0.033)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庭数		0.046*** (0.011)			
政治精英×村创业家庭数		-0.008 (0.032)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业数			0.042*** (0.011)		
政治精英×村小微企业数			-0.006 (0.032)		
村落创业氛围:企业载体				-0.047 (0.038)	
政治精英×企业载体				0.105 (0.080)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					0.095*** (0.011)
政治精英×创业亲友数					0.062** (0.030)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0.157 (0.098)	-0.239** (0.100)	-0.239** (0.101)	-0.233** (0.109)	-0.276*** (0.100)
观测值	9879	9879	9879	8292	9846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完整结果略去备索。

在变量选择上,本文考虑到乡土情境下农村党员和干部在意识形态、自身权力、责任和可调用、分配的资源上存在一定差异。掌握村庄正式权力和资源的村干部,基于政治方面的相对优势,在村民自治中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是连接地方政府与村民间的“结构洞”。故本文将农村政治精英聚焦于村干部群体,采用指标“是否(曾)担任过村干部”替代主模型中的自变量。在总体样本中,村干部占比约为13%。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结果说明,将农村政治精英限定为村干部后,政治精英的创业概率仍旧显著低于非政治精英,大约低19% ( $p < 0.01$ )。创业氛围的调节作用如模型2~模型5所示,模型2、模型3表明,村落创业氛围中,村创业家庭数和村小微企业数均未能显著影响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这与主模型结果一致。模型4结果表明,村企业载体有效弱化农村政治精英(村干部)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模型5结果表明,“朋亲圈”内的创业氛围越强,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朋亲圈”内的创业氛围越弱,该负向关系越强,与主模型结果一致<sup>①</sup>。

表6 稳健性检验二:更换自变量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农村政治精英:是否(曾)是村干部	-0.551*** (0.043)	-0.551*** (0.043)	-0.551*** (0.043)	-0.592*** (0.056)	-0.561*** (0.044)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庭数		0.045*** (0.011)			
政治精英×村创业家庭数		-0.006 (0.043)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业数			0.043*** (0.011)		
政治精英×村小微企业数			-0.053 (0.042)		
村落创业氛围:企业载体				-0.041 (0.036)	
政治精英×企业载体				0.219** (0.105)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					0.108*** (0.015)
政治精英×创业亲友数					0.090** (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1.062*** (0.095)	-1.143*** (0.098)	-1.146*** (0.097)	-1.145*** (0.104)	-1.181*** (0.097)
观测值	11271	11271	11271	9506	11232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① 限于篇幅,调节作用图略去备索。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代替非线性概率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回归中,仍旧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村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回归结果与主模型保持一致(如表7所示)。综上,本文研究结论拥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三:主模型更换回归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法)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农村政治精英:是否(曾)是村干部或党员	-0.134*** (0.011)	-0.134*** (0.011)	-0.135*** (0.011)	-0.137*** (0.013)	-0.135*** (0.011)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庭数		0.016*** (0.004)			
政治精英×村创业家庭数		-0.005 (0.010)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业数			0.014*** (0.004)		
政治精英×村小微企业数			-0.009 (0.010)		
村落创业氛围:企业载体				-0.013 (0.013)	
政治精英×企业载体				0.034 (0.027)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					0.038*** (0.005)
政治精英×创业亲友数					0.017*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0.152*** (0.031)	0.124*** (0.032)	0.124*** (0.031)	0.123*** (0.033)	0.115*** (0.031)
观测值	11271	11271	11271	9506	11232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五、进一步探讨

### 1. 农村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区域差异

对主效应进行分区域检验,既反映区域异质性,又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针对我国东南、环渤海、中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六个区域下,农村政治精英均表现出较低的创业可能性。将Probit模型的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后可知:传统文化印记对于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牵绊”作用在我国西南地区最为明显,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21%;在环渤海地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18%;在东南、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12%;在西北地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13%。

表 8 主效果分区域检验<sup>①</sup>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地区		全国	东南	环渤海	中部	东北	西南	西北
农村政治精英	回归系数	-0.404*** (0.034)	-0.339*** (0.058)	-0.515*** (0.103)	-0.325*** (0.073)	-0.325* (0.174)	-0.604*** (0.081)	-0.356*** (0.096)
	边际效应	-0.147*** (0.012)	-0.124*** (0.020)	-0.184*** (0.034)	-0.120*** (0.026)	-0.120* (0.062)	-0.212*** (0.026)	-0.131*** (0.034)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11271	3458	1372	2377	599	2014	1451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针对模型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针对边际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2. 农村政治精英创业动机探索:“生存推动”还是“机会拉动”?

创业动机反映着创业者的需要及创业目标,是创业选择的根本动力。窦大海和罗瑾琰(2011)<sup>[63]</sup>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创业动机归纳为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经济动机解决个体生理和安全需要,社会动机解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Gilad和Levine(1986)<sup>[64]</sup>基于推拉理论,将创业动机分为生存推动型和机会拉动型。前者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为解决“温饱”或改善生活现状而被迫创业,这也反映创业者的经济动机;而后者是由于发现了创业机会、为寻求独立或成就一番事业而主动创业(杨婵等,2017)<sup>[7]</sup>,反映创业者的社会动机。

“千村调查”问卷收集了农村创业者创业的原因,包括:“1.发现了机会;2.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3.改善生活;4.寻求更大独立;5.成就一番事业;6.其他”。其中,“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和“改善生活”表现出以生存为目标的经济动机;而“发现了机会”“寻求更大独立”以及“成就一番事业”则表现出机会驱动的社会动机。基于此,本文构造虚拟变量“生存型创业”:若创业原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或“改善生活”,该变量记1,否则记0;构造虚拟变量“机会型创业”:若创业原因为“发现了机会”“寻求更大独立”或“成就一番事业”,该变量记1,否则记0。本文构造Probit模型探索农村政治精英创业到底是由“生存推动”还是“机会拉动”?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在控制了创业者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家庭经济水平及所在区域后,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创业者低约5%;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创业者高约4%。这说明,创业机会在正式制度缺失的农村具有稀缺性和排他性(Davidsson和Honig,2003<sup>[65]</sup>;叶文平等,2018<sup>[62]</sup>),故更容易被农村政治精英感知和捕获。

表 9 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与其创业动机<sup>②</sup>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农村政治精英	回归系数	-0.130** (0.051)	0.101* (0.052)
	边际效应	-0.052** (0.020)	0.039*** (0.020)
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家庭经济水平及所在区域	
观测值		4393	4393

注:\*\*\*、\*\*和\*代表1%、5%、10%的水平上显著;针对模型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针对边际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① 限于篇幅,分区域检验的完整结果略去备索。  
② 限于篇幅,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与其创业动机的完整结果略去备索。

## 六、结 论

### 1. 研究结论

农村政治精英在相对封闭、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地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当下脱贫减贫、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上,农村政治精英甚至决定能否“响鼓重锤”攻克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在国家“双创”政策背景下,很多农村政治精英投身创业,身体力行带动村庄经济发展、解决村民就业“难题”,故挖掘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我国农村具有特殊的历史进程,传统文化思想在农村演进中仍发挥持续的印记效应,尤其是“庇护—依赖”关系及其衍生出的“官本位”“安于现状”等小农思想限制着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本文研究发现:(1)相较于农村非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对创业选择更加回避,且这种效应在我国各区域表现出普遍性。其中,西南地区的农村政治精英对于创业的回避态度更为明显,而其他地区中农村政治精英对于创业的回避态度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这说明:尽管农村政治精英拥有更充裕的资源、面临更佳的创业条件,但在传统文化印记下,他们普遍不愿主动利用这些资源创业,即在农村独特的文化环境中,政治资本的“动力”作用受到了限制。(2)随着农村开放性的增强,创业氛围代表的新兴创业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效应”进而导致传统思想印记的式微,创业氛围不仅能推动农民创业,更能弱化农村政治精英对创业的回避态度。(3)农村朋亲强关系通过高度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感对政治精英创业产生了“带动效应”,并在创业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4)相对于非政治精英,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由于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资源,更能捕获与利用商业机会,故其创业动机更多表现为机会推动型。

### 2. 对策建议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更重视农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予以政治精英,尤其是活跃在扶贫、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更多关注与支持。农村政治精英能力和资源占优、拥有更佳创业条件。通过引入创业机会、强化制度建设、构建公平的创业环境,调动本土精英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让他们在乡村振兴、农村创业和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现更宝贵的人生价值。其次,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中国情境下,对农村创业的推动要充分结合我国农村特殊的生态、文化环境。相较于城市创业,农村创业既面临信息不足和市场局限、创业主体能力缺乏等现实“瓶颈”,更受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如“庇护—依赖”“等级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使农民对创业具有不一样的思考与选择。因此,有必要从农村生态、文化环境及其印记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村创业活动并给予更多关注。第三,要更加关注农村文化建设,培育新时代农民价值观和独立、规范的市场参与精神。文化是国家、民族发展中的深层动力,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连续而深刻。作为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我国农村培养了农民淳朴和善、务实包容等“闪光”特质,但在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演化中,也存在“庇护—依赖”与“安于现状”等小农意识。故农村文化建设既要立足传统思想,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品质,也要理性吸纳外界多元文化,将城市中有活力、讲规则、敢拼搏的创业文化引进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并发展新时代农民价值观。最后,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注重城乡资源的双向流通,良性互促,因地制宜地实现农村机会开发。一方面,将外部信息、资源引入农村,避免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出;另一方面,依靠农村深厚的人情纽带与农民的乡土情怀将外部精英“引流归乡”,引导体制内外、不同领域精英间的交流,充分发挥人情、朋亲网络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政治文化意识与市场经济活动齐头发展的“双通道”。

### 3. 研究展望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亟待进一步探讨:首先,受限于样本数据,本文无法对印记的变化过程进行长期跟踪分析。而文章基于印记“牵绊”的视角和资本“动力”的视角所提出的两条假设可能在时间上存在相互转化的临界点,未来研究可就此进行深化。其次,本文从文化印记的视角挖掘了农村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并未考察该印记对农民创业的过程和乡村企业发展所产

生的影响。未来可从印记视角探讨政治精英对农村企业绩效、资源获取及责任承担方面的影响。第三,本文对于“外部文化如何影响农村传统文化印记”的分析并未考虑到当地文化包容度、传统文化强度等因素的作用。未来可从这两方面入手,对“农村当代文化建设”进行更为深入的考量。第四,本文对于研究问题的分析并未全面考虑不同村落场域内的微观差异,如:社会阶层、风俗习惯以及自然条件等。这种更为细致的要素如何影响农村创业以及农村文化构建值得后续研究继续探讨。最后,本文对于农村开放性的探讨仅聚焦于文化层面,而一个聚落空间的开放过程体现在经济、人口流动、政策等各方面。回望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逐步的对外开放、经济互通,而农村要想发展,必然也要如此。未来可基于更多层面对农村开放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进行探索。

## 参考文献

- [1] Kamani, A. The Mirage of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How the Private Sector Can Help Alleviate Povert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07, (4): 90 - 111.
- [2] 邹铁钉. 中国城乡户籍与性别的重叠效应——身份公平的养老改革[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4, (6): 158 - 169.
- [3] 陆铭, 李爽. 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8, (9): 161 - 165.
- [4] 龙静. 创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基于创业发展阶段的分析[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5): 40 - 50.
- [5] 吴一平, 王健. 制度环境、政治网络与创业: 来自转型国家的证据[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5, (8): 45 - 57.
- [6] 田莉, 张玉利, 唐莹瑞, 魏立群. 遵从压力或理性驱动? 新企业政治行为探析[J]. *天津: 管理科学学报*. 2015, (3): 16 - 30.
- [7] 杨婵, 贺小刚, 李征宇.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12): 170 - 188.
- [8] 杨善华. 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2000, (3): 103 - 110.
- [9] Marquis, C., and A. Tilcsik,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1): 195 - 245.
- [10] Pato, M. L., and A. A. Teixeira, Twenty Years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 Bibliometric Survey[J]. *Sociologia Ruralis*, 2014, (1): 3 - 28.
- [11] Bar-El, R., and D. Felsenstei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mparing Urban and Rural Patterns of Locational Choice in Israel[J]. *World Development*, 1990, (2): 257 - 267.
- [12] Oi, J. C.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J]. *World Politics*, 1985, (2): 238 - 266.
- [13] 纪莺莺. 文化、制度与结构: 中国社会关系研究[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5): 60 - 85.
- [14] 周庆智. 县政治理: 权威、资源、秩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15] 彼得·什托姆普卡. 信任: 一种社会学理论[M]. 程胜利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6] 李炳坤. 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历程回顾与前景展望[J]. *北京: 管理世界*, 1993, (5): 156 - 165.
- [17] Fan, Y., N. Chen, and D. Kirby, Chinese Peasant Entrepreneurs, An Examination of Township and Village[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6, (4): 71 - 76.
- [18] Marquis, C. 理论化历史进程: 对中国管理的启示[J]. *广州: 管理学季刊*, 2018, (3): 1 - 24.
- [19] 李根蟠. 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J]. *北京: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 (1): 69 - 86.
- [20] 阎万英. 我国古代人口因素与耕作制的关系[J]. *南京: 中国农史*, 1994, (2): 1 - 7.
- [21] 张琳.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政治逻辑分析[J].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 117 - 120.
- [22] 张佩国.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2): 171 - 188.
- [23] 赵世瑜. 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1): 138 - 196.
- [24] 李新春, 叶文平, 朱沆.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基于 GEM 数据的跨国(地区)比较研究[J]. *天津: 管理科学学报*, 2017, (8): 112 - 126.
- [25] Walder, A.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1986.
- [26] Oi, J. C.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27] Wank, D. L.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8] Scott, J. C.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2, (1): 91 - 113.
- [29] 王春光, 赵玉峰, 王玉琪. 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2018, (1): 63 - 88.



- [30] 杨华, 欧阳静. 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3, (5): 47-63.
- [31] 曲延春. 差序格局、碎片化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性治理[J]. 北京: 中国行政管理, 2015, (5): 70-73.
- [32] 贺雪峰.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迁[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 11-16.
- [33] 胡彬彬, 邓祁. 变迁与转型——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N]. 北京: 光明日报, 2019-2-18.
- [34] 谭远发. 父母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工资溢价: “拼爹”还是“拼搏”?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3): 22-33.
- [35] Judge, T. A. Political Influence Behavior and Career Succes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2, (1): 43-65.
- [36] Liu, Z.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in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003, (4): 823-849.
- [37]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2, (4): 297-323.
- [38] Lau, T., K. F. Chan, and S. H. C. Tai.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of IJVs in China[J].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2010, (1): 6-22.
- [39] 秦立建, 陈波.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4, (10): 91-99.
- [40] Ahsanuzzaman, A. Three Essays on Adoption and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Bangladesh[D]. Virginia Tech, 2015.
- [41] 董磊明, 郭俊霞. 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8): 147-160.
- [42] 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1): 95-120.
- [43]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4] 付英. 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J]. 北京: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 154-163.
- [45] 肖唐镖.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6, (9): 64-70.
- [46] 齐玮娜, 张耀辉. 区域环境差异与创业质量的“马太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 SYS-GMM 检验[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5, (7): 35-44.
- [47] 吴小立, 于伟. 环境特性、个体特质与农民创业行为研究[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 19-29.
- [48] 杨卫忠.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来自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J]. 北京: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2): 38-51.
- [49] 周亚越, 俞海山. 区域农村青年创业与创业文化的实证研究——以宁波为例[J]. 北京: 中国农村经济, 2005, (8): 37-44.
- [50] Tsui, A. S., S. S. Nifadkar, and A. Y. Ou. Cross-National,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Advances, Gaps, and Recommend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3): 426-478.
- [51] Noseleit, F. Th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Self-Employed[M]. Entrepreneurship and Culture, 2010.
- [52] 蒋剑勇, 郭红东. 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向[J]. 北京: 中国农村观察, 2012, (2): 20-27.
- [53] 王淑芹, 刘畅. 我国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的反思与超越[J]. 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 (2): 145-152.
- [54] 张玉利, 杜国臣. 创业的合法性悖论[J]. 北京: 中国软科学, 2007, (10): 47-58.
- [5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56] 董静, 徐婉渔, 张瑜. 我国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调查研究——人情关系与“规范化”经验的影响与互动[J]. 上海: 财经研究, 2018, (1): 20-32.
- [57] 郭云南, 姚洋.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3, (3): 69-81.
- [58] Kwon, S. W., and P. Arenius. Nations of Entrepreneur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3): 0-330.
- [59] 杨隽萍, 于晓宇, 陶向明等. 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创业风险识别[J]. 天津: 管理科学学报, 2017, (5): 40-55.
- [60] 金迪, 蒋剑勇.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的农民创业机理研究[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4, (12): 180-181.
- [61] 蔡栋梁, 邱黎源, 孟晓雨, 马双. 流动性约束、社会资本与家庭创业选择——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8, (9): 85-100.
- [62] 叶文平, 李新春, 朱沆. 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8, (1): 139-156.
- [63] 窦大海, 罗瑾璋. 创业动机的结构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1, (3): 182-183.
- [64] Gilad, B., and P. Levine. A Behavior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Supply[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86, (4): 45-53.
- [65] Davidsson, P. and B. Honig.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3): 301-331.

# Impetus or Obstruction: Political Elites of Rural Area,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and Entrepreneurial Choice

WAN Jun-bao, ZHA Jun, XU Wan-yu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la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s rural area has entered the critical period. Rural political elites play the “key role” in the “tough battl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due to their capacit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Many rural political elites devote themselves to entrepreneurship so a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ccording to imprinting theor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re easily imprinted by specific events,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s in their “sensitive period” and will be affected by them continuously. For village political elites, the “patron-client” thought derived from Chinese farming culture and village evolution impose imprinting on their thought and behaviors.

Three questions are explored in the present study: (1) Is the rural political elite more likely to start a business in Chinese village? (2) How does the emerging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affect the entrepreneurial choice of political elites? (3) What role 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play in the elite’s choice of entrepreneurship? To uncovering these doubts, we carried out the study based on imprinting theory and made the empirical study using 14,122 questionnaires of the “Thousand Village Survey” data as the sample. We adopted the Probit model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and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t the village level so as to avoid the correlation among residents in the same village. We also conducted a sensitivity analysis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by adjusting the sample size, changing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s well as the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Und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imprinting of “patron-client”, the rural political elite has a lower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2) The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weakens the obstruc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mprinting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political elites through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trust generated by the strong connections betwe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3) Becaus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re scarce and exclusive in rural areas where formal institutions are absent, rural political elites are more likely to capture opportunities for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The paper conduc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bout the rural entrepreneurial study based on imprinting theory, proposing the obstruc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patron-client” cultural imprinting on “resource” and “impetus” function of political capital. And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percussive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of the emerging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on the traditional imprinting culture effect under the impl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vealing the dynamic declin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imprinting. Beside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 of strong “guanxi” of “friends and family” on the effective diffusion of intrinsic culture. For practical contribution,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rural elites in village revitalization, suggesting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ut on how to stimulate the entrepreneurship passion of grass-roots cadres. Besides, promoting the culture flow and bring the new and energetic culture into the rural area will promote both culture upgrade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Key Words:** political elites; the imprinting of “patron-client”;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entrepreneurial choice

**JEL Classification:** L26, L38, O18, P42

**DOI:** 10.19616/j.cnki.bmj.2019.07.004

(责任编辑:李先军)